

# 日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 开端期分析

叶 坦

## 一、问题的提起

本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大发展,东亚在世界格局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核心——经济思想与学说,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著作中东亚基本上还是空白。我们知道,经济思想史一般均是以西方近代为基础的,理论与方法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有别于西方的东亚文明中,尤其在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的中国,漫长岁月集积下来的大量文献中,保存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珍贵资料,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而独具特征的经济思想材料。在早于西方社会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状况中,汇集了中国传统时代特有的经济思想和学说,以及不同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而且,这些学说和理论在东亚各国即所谓“儒教文化圈”的历史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另外,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树,特别是在经济思想方面,同样具有值得认真总结提炼的价值,体现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典型而普遍的现实意义与学术意义。

中国经济思想史属于经济学的一门独立性分支学科,研究自古及今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中国主要大学和经济学研究机构大都设有这一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专业。这门学科有着许多独特的性质,既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中介”特性,又是传统汉学的重要部分,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产生影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艰难的开拓和大量的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性研究,主要是中国和日本两国学者分别从本世纪20~30年代开始的,70多年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

成就。<sup>①</sup>可惜的是,至今没有系统总结和研究。

笔者先后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有幸在日本进行研究考察,在进行中日比较研究课题的过程中,有机会探讨一些以往不大为人注意的问题,如日本学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贡献,以及日本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们几乎都比较注意中国问题等,这在中日两国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以及学术史中都很有深入研究的价值。迄今的中国日本学研究做了许多方面的工作,但是在日本的学术研究史、经济思想史、中国学研究史尤其日本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等方面比较薄弱;而日本现今的学者,尽管继承和发展了本国诸多的优秀学术传统,但在了解和总结前辈学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也有限。这些问题囿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是传统学科划分的局限所在。例如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者不大会考虑本国以外的同行研究,中国有关研究日本的学科也很少注意日本的中国学,而日本的专业中还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在日本所谓“经济思想史”基本上都还是西方的内容。这样的现状与时代的发展和东亚的应有国际地位是不相称的。

当我们即将告别这个世界,去迎接新世纪学术发展和深化的挑战时,很有必要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史,特别是这门学科的形成期进行重点的研究考察。可以说,对本世纪学术研究史的总结分析,是跨世纪学术发展不容忽视的基础工作。本文系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性研究开端期考察的一部分,由第2届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京·1995.8)发表论文中的有关部分修改而成,旨在指出问题,并重申我们对各国开展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倡导。

##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研究

考察学术研究史,离不开其所植基的时代环境。

就世界整体格局而言,本世纪前半期的战争和后半期的建设大体构成时代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1920~30年代,作为前半期的重要时期,具有研究的典型性意义。众所周知,这20年间的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相对的稳定与潜伏的危机,同局部的战争与全球性经济恐慌交织迭合,勾绘出一幅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的波澜壮阔的画卷;也反衬出列强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与危机。世界进入这一转折时期后,谋求发展经济和强盛国力颇具普遍的意义;而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恐慌,更迫使各国千方百计寻求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因此,经济学研究和理论的探索在这一时期十分活跃,出现了大量著述成果。与此同时,随着民族经济独立与民族文化的发展,研究和探索本国经济思想史的努力,也成为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认为,20~30年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文化学术大发展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极不寻常的一页,颇值得认真研究。

这时的中国同样是社会大变革的重要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促进了社会文化和思想学术的发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战争,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强盛国力抵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推动了实业与理论的新发展。这一时期,孙中山的国家革命学说与实践,唤起了知识界“振兴中华”的努力;经济学说也从介绍西洋著述为主的局面,向着“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而发展。<sup>②</sup>

这样的学术转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学者对西洋经济学说的译介,除了在深度和广度上有较大发展外,对日本学术成果的中译,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有发展,而且自著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著述和经济思想史著作逐渐增多。第二,在大学和一些专科学校开设的经济学课程,更加细密和广泛,包括一些中学也开设了相关课程。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专门性、系统性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问世,并且相关的专著和论文数量比较可观。同时,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在所大学开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研究专著主要有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1936)上卷、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赵

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等,以“中国经济思想史”命名的专著出版,在此之前还没有。<sup>③</sup>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论文发表。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大约有450篇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论文,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1926年以后发表的。<sup>④</sup>中国学者这一时期的研究,重要意义在于自此开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性研究,成为探索中国经济学史发展的开端。

应当说,中国经济思想史自最初的研究起,就不仅仅局限于本国。我们知道,中西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很早,如汉代张骞通西域等,自13世纪末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以来,经16世纪后传教士的来华,到17、18世纪欧洲掀起“中国热”,中西文化产生较大的相互影响。自此以来西方学者们在译介和研究中国文化方面做出很大贡献。例如日本著名学者泷本诚一所著《欧洲经济史》(1931),即以“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作为副标题。在20~30年代出版的西译中国典籍中,与经济思想史有关的译著主要有:G·G·LDuvandak译的《商君书》(The Book of Lord Shang) London 1928年出版,H·H·Dubo译的《荀子》(Xun-tzu) London 1928年出版,E·M·Gale等译的《盐铁论》(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Holland Leiden 1931年出版。此后西方学者还翻译了其他的相关文献,并进行了有关的研究。遗憾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很难称得上有系统性的研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这一时期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以及中国一些学者陆续发表著述,探讨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尤其是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思想渊源问题。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往更是源远流长,日本的汉学研究在世界上是很著名的。研究中国政治或哲学等等的汉学家们的研究中,有的也涉及到经济思想的内容,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思想与学说并不独立,这大概也是世界古代经济学说的共同特征,因此,日本学者最初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是不系统的。有一项非常令人敬佩的大型工作需要提及,即大正后半期起由福田德三先生倡导的,对中国正史中的“食货志”的译注计划,当时公田连太郎、和田清、加藤繁等著名学者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20~30年代的日本亦处在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期,一方面,自由民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对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相当突出,为转

嫁经济金融危机的国内矛盾,法西斯势力不断谋划对外侵略,主要矛头指向中国。从1931年9月18日进攻中国东北起,直到1937年7月7日全面开始侵华战争,中国一直成为其侵略的主要目标。这在客观上也需要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当然这不同于普遍的学术研究。自2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开始了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专门性研究。从田崎仁义、田岛锦治、小岛祐马到穗积文雄、出口勇藏再到上野直明、桑田幸三、井泽弥男、多田显诸位,用可观的研究成果勾勒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谱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的研究开端,与中国学者对本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性研究几乎同时。唐庆增先生曾高度评价日本学者的研究,说:“外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日人尚称努力。……至欧美人士研究中国哲学者尚不乏人,若专就经济思想而言,从未有人加以精密之观察也”。<sup>⑨</sup>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研究的主要贡献与特点是:第一,在专题研究论文的基础上,一些明确标注题为“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专著问世。第二,研究重点集中在“上古”阶段,即中国先秦时代,另外有一些研究明末清初的论文发表。第三,研究方法主要是传统汉学方法与西洋经济学理论的结合,以及因学者不同的学科特长,研究大抵依中国思想史中的学派划分为基本规范,观点与结论也还不一定成熟。第四,由于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有一定的局限,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系统性还不够强,视为系统研究的开端期比较客观。第五,这一时期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田岛锦治先生曾在京都帝大(现京都大学)进行“东洋经济史”的讲授,主讲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史。据闻,这恐怕是当时在中国以外绝无仅有的。以下就对日本学者的主要成果进行分析。

### 三、日本学者主要研究专著的个案分析

前述日本学者在20~30年代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代表专著即以下分析的三部曲。

#### (1) 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

田崎仁义是经济学博士,其父对汉文学造诣甚高,从而有着浓厚的汉学家学渊源。他早年就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后改名为商科大学),学习法制经济之学。曾得福田德三、关一、三浦新七、坂西由藏、建部遁吾诸位先生的教诲提携,立志刻苦攻读、研究

著书,受到福田先生的勉励,并得到内田藏、狩野直喜先生的指教和帮助。后来他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中国学方面的指导,又到哈佛大学和华盛顿顿府议会图书馆收集资料。他把此书的手稿带在身边,故而可以不断修改和完善。

这时,作者所写主要是此书的第2部分,即组织与制度的内容,共4编,于1920年秋完成。归国后三度请福田先生指教,而明白了应当补充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渊源的研究。于是,又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写出了此书的第1部分——有关思想的两编。至此即1923年全书两部分共6编全部完成。<sup>⑩</sup>1924年11月30日由内外出版株式会社出版发行,十天之后再版发行。中国的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1月出版了王学文的中译本,同年10月再版,可见此书的价值。另外作者还著有《中国古代经济史》等,亦有中译本出版。<sup>⑪</sup>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是第一部以“中国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全书两部分6编,编下章节不等。第1部分“思想”两编,一是“论世界古今原始诸民族视土地和农业象征女性的思想及其经济史之价值”,二是“论中国古代视土地和农业象征女性或阴性的思想”。第2部分“组织及制度”4编,一是“封建制度的发生期”,二是“《礼记·王制》中所示之封建概略”,三是“《周礼》及其封建组织”,四是“《周礼》中所示之土地制度”,后有“结语”和“参考文献”。可惜中译本割舍了这份颇有价值的参考文献,此文献不仅提供了英、日、汉三种文字的相关资料,而且这些资料作为第一部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可参考文献,其学术价值可以想象。

此书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1. 作为第一部名为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著作,具有开创意义。2. 全书从制度与思想的视角,考察古代农业中国,确切说来,主要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的综合运用。3. 书中提出了一些观点,对于启发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具有意义。

从前述全书的基本布局中,不难看出研究范围限于中国上古的周代及此前,主要分析的资料是《周礼》、《礼记·王制》,部分涉及《易经》等文献。作者说明此书专意论证的是:1.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组织上的特色,2. 基此特色所产生的经济上的组织与制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农业古国中视土地和农业为女性、阴性的同一象征,这样的观念也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关键。探讨古代经济思想史的根本

源时,可以发觉土地、农业等经济事务与女性、阴性等生殖概念有同一性象征的关联,即“确定妇女与经济的同一(identity)性”。<sup>⑧</sup>他认为,不惟如此,连管土地和农业的神——地神(Earth-mother)、谷神(Corn-mother),也以女性或阴性为象征,并认为是“各原始民间普遍存在的观念”。<sup>⑨</sup>书中指出以农业土地为女性阴性的观念之所以普遍存在,不仅有神话原因还有经济原因,即原始农业中女性地位优越,妇女是经济生活的主角。

作者考辨古代中国的神农为女性神,又考《易经》的说法,地为阴、为坤、为女性阴性,其方位配北方。接着从中国古代诸礼制的考据中,论证其观点,提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及土地制度,都是基于这种思想而发展起来的。<sup>⑩</sup>与土地和农业以及其他经济事物相关的官制,以至制度政策都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全书的大半就是考察礼制中表现出的前述思想在官制、城建、方位等组织制度中的反映。他提出“地官”就是主司经济事务的官职,而“商业交换的市场,设置在阴性的方位——王宫之北,配属女性王后管辖;又以工部之官配以老阴之冬官,其以经济为女性一目了然。”<sup>⑪</sup>

为了从思想中找到足够的证据,作者用的后两年半时间写的“思想”两编,反复考证各原始民族的宗教和神话,尤其下功夫研究古代中国的情形。然而,此书大概是为说明制度而寻思想根源,确实有较大局限。至少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比较薄弱。当然,此书的观点也还有较大的推敲的余地。

(2)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

田岛锦治(1867~1934)号赤城,1867年9月7日生于东京。1891年入东京帝大法科大学,1897年留学德国学经济学财政学,1900年回国,任京都帝大法科大学教授,主持经济学第一讲座,在1901年时获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又担任财政学讲座及一些专门学校的课程。1909年任京都帝大法科大学长,并出使中国。1912年赴欧美各国半年多,1918年当选京都市议员,次年任京都帝大评议员并出任经济学部长。1920年担任法学部教学工作,次年任农学部创设委员。1922年兼任立命馆大学学监,1923年时再赴欧美,1927年任立命馆大学校长,京大名誉教授。1934年6月28日于京都逝世。<sup>⑫</sup>

田岛先生一生兼任许多学术、社会、团体等职务,并多次受奖叙勋。在他逝世后,其后学本庄荣治

郎和高木真助等氏,整理其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讲义和论文,汇编为此书于1935年1月由有斐阁出版。本庄先生是日本经济思想史杰出的研究者,他在为此书所写例言中,说明田岛先生的讲义虽然涉经济学诸学科,但晚年特别致力于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之阐明。此书系整理者在《东洋经济史》稿本基础上,补入已发表的8篇论文认真汇编成较有体系的专著,无法收入本书体系的另外4篇论文作为附录置于书后。<sup>⑬</sup>

全书由“绪论”和“本论”两章组成。绪论主要论述“本讲义的目的及范围”,和“中书”中所见的经济思想”。其后是附录和作者年谱与著书论文目录。此书的主要价值在于:1. 此书系当时最具经济学意义的一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而且反映了作者的理论功力。他不仅常在名牌大学主讲经济学诸科,而且此前已出版《经济与道德》等著作。2. 作者试图从理论上对以西方近代为基础的经济学进行发展,其书名即是证明,而且其汉学功底扎实,具有把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研究结合起来并有所突破的实力。3. 作者对中国古代文明十分推崇,并且提出中国文明与日本有着密切关联,这就为东亚社会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埋下了伏笔。4. 全书通过对《尚书》、《大学》、《中庸》、《论语》四部中国经典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见解的观点,对后世有启发。5. 作者是当时最早系统地对中国经济思想进行研究的学者,时间最久(1894年即开始发表此类研究的论文),成果甚丰,而且在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功绩实应铭记。当然,此书亦有不足,如本非专著,所以书的系统性就显薄弱。再就是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倍加尊崇,使其一些认识难免偏颇,如认为中国人的自以为是、妄自尊大等陋习,也不应受责,因为具有普遍性等等。另外,作者的研究局限于上古,因此,就几千年中国经济思想史而言,也是有局限性的。

作者指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之创立是“自亚当·斯密1776年著《国民之富》而成立的,有关经济的思想是从上古世界诸国的口碑及文献中征集的,尤其在古来亚细亚……”。<sup>⑭</sup>他盛赞古代中国之辉煌与文献之浩瀚,同时指出从古文献中抽出经济思想很难,“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是与道德及政治的思想结合而浑然一体”,而且研究经济思想史,“必须通晓其时代前后的经济事实,而经济事实亦常与其他的社会事实混杂错综,因此抽出评论非易”。<sup>⑮</sup>这就指明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特点与难度。但田岛先生知

难而进,提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理由:1.“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是与包括其在内的道德及政治思想一起,对东洋尤其是我国上古以来至今的国民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恰若希腊罗马之学对现代欧洲诸国民之影响”。2.“然而,迄今经济学史之著书,犹多出欧人之手,且此等著书多以希腊为经济思想历史之始点,偶而涉及东洋亦不过希伯来(Hebrew)及印度精密,尤疏于中国”。3.“中国上古的经传及诸子之书,我国及欧美学者之翻译或评论者虽不少,但从中抽出经济性思想而评论之并不多,特别于我国犹然”。这就是应当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理由。作者不仅从前述理由说明应当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而且提出“以余卑见,中国上古之道德政治及经济的思想,与希腊罗马相比,不仅不逊色而且卓越之处亦不少。”他还认为西洋人重视希腊罗马的研究还情有可原,倘若日本人也如此则是“不免有颠倒本末轻重之讥了。”<sup>28</sup>这就阐明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的应有地位,以及东洋人更应当研究东洋经济思想史。

正由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与道德和政治的不分,作者的研究很大部分在于分析儒家经典中道德政治的内容,这深刻地反映出仅仅以上古为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难免的局限性。除《管子》等“子书”外,以上古儒家经书为对象的研究必遇此类问题。这也看出那时的日本学者尊崇中国上古文明,而仅限于此会对经济思想史研究造成局限性。当代日本著名中国学家沟口雄三先生,曾撰专文分析“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很有参考价值。<sup>29</sup>

应当注意此书有若干独到见解,如他说:“读《禹贡》之第一感是,晚近欧洲的财政学者作为金科玉律所主张的课税公正的法则,在当时已经实行,不只是据田地之良否,而是参酌种种情况来定田赋的差等,因各州的土宜土产征贡物,即课税一般主义又是以平等主义即能力主义之产物。”<sup>30</sup>又如他分析“中国上古的圣贤虽重农,其初亦非轻视工商。《洪范》之八政,居第二位的食货,即不外乎工商保护之政策”。<sup>31</sup>他还引用其他资料证明上古不轻商,很有见地。并在陈述“管子必非贱商贾”之说中,引用了管子关于“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基石也”的重要史料,但又比较客观地分析了管子的“四民分业定居论”,表现了作者中肯的评判。<sup>32</sup>更有价值的是,他分析管子一系列有关社会分工,和对社会各行业生产及产品的论述,得出“诚农、诚工、诚商,孰非本业?余谓以管子之

‘劝本事、禁末业’之语,为劝农禁商恐误谬之解释欤?”的结论。<sup>33</sup>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是作为“附录”而收入此书的论文中的内容,是否与编者的判断取舍有关呢?我们知道本庄荣治郎先生的日本经济思想史造诣颇高,不知其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认识如何。

### (3) 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

小岛先生此书以及其他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一直鲜为人知。据我所见,仅1936年出版的黄汉《管子经济思想》一书的参考书目中列了小岛先生《中国经济思想之出发点》一文。限于条件,小岛先生的生平目前我知道的还不多,只知他曾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部,又入文学部学习,十分重视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而且对法国社会学的造诣很高。1966年11月逝世,而且在70岁以后还写了《中国的伦理思想》一书,颇得好评。他1917年即发表《儒道二家经济思想的特征》论文,一生治中国思想史颇多业绩。其后学提出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史格外用心,其学术特征是在看似平凡的事实中,研究出全新的结论。另外,他的研究不仅在古代,而且对晚清至民国初期的思想也很注意,如对顾炎武、王夫之、龚自珍等人经济思想的研究。<sup>34</sup>

此书于1936年11月由岩波书店出版,作为“岩波讲座”中的“东洋思想”之一。全书分前后两篇,前篇是“儒家的社会经济思想”,后篇是“儒家以外学派的社会经济思想”。儒家之中,主要研究封建制度与家族道德、道德的阶级制度与知识阶级的统治、革命的承认与否认、德化教育与世界主义、社会政策性的诸思想等内容。非儒家则研究墨家的兼爱思想、农家的君民并耕说、道家的虚无思想、法家的强国弱民说、司马迁的自由放任说等。

此书的主要价值在于:1.这是从思想史角度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并且是以社会思想史的方法进行研究的。2.此书的研究内容超出了先秦时代,这也是那时唯一一本从上古谈到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3.此书从思想发展史的脉络中,把握经济思想的轨迹,并且时贯几千年,相当不易。当然,也正由于这些特点,此书难免因篇幅有限而要包罗太多的内容而显得薄弱。再就是在规划学派时,明显尊儒抑它,而且学术的体系性也显不足。也由于是以思想史研究为主要方法的,所以经济意义比较淡。但是,此书的许多观点和认识颇有价值,开启了社会思想史中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先河。

例如,作者分析“儒家为何力主经济上的欲望限制,这是由于儒家讴歌的封建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立足点的。然而,孔孟二子只讲统治阶级的欲望限制而不及工商业者,是由于当时的工商业者尚未在社会上显示出势力,到秦汉以后,为维护这种封建经济结构,不得不极力排斥工商业者。因此,儒家经济上的口号也发展成为‘重农而贱工商业,禁奢侈而劝节俭’”。<sup>⑧</sup>不论具体论点如何,这种发展的认识方法是颇值称道的。又如他分析农家学派时,指出:“农家肯定农业之外经营独立的百工之事是明确的,而且与此同时农家并非只主张个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他们认为农夫百工间的分工是必要的,而且也明白他们相互间的交易是不可缺的。”<sup>⑨</sup>另一些认识也有独到之处,如一般都认为汉代以后儒家立于“一尊”的地位,作者却提出汉以后是法家思想作为实际政治之指导,“儒家的思想不过扮演著粉饰表面的角色。”<sup>⑩</sup>

从这三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20~30年代日本学者的研究各有特色,从各种角度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了研究,尽管有不足,但贡献不可磨灭。此后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如前所述亦有可观成就问世,特别是40年代的穗积文雄先生的业绩,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70年代的桑田幸三之书,大体可以反映这时日本学者的研究情况,我们的中译本于199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桑田先生师承穗积先生,并注意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虽年过古稀却与我们一直保持友好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研究,与从东洋史学或中国哲学等领域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大相同,基本上是以经济学出身者为主的,这与中国的情形差不多。但是,中国自此逐步形成独立学科,而日本至今都未形成。另外,日本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以京都地区为主,这也是研究学术史应注意的。

#### 四、结 语

本文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跨世纪学术发展的前提是对本世纪的学术研究史进行总结分析。第二,东亚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国际学界走向21世纪学术深进的重要方面。第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世界经济思想史、尤其对东亚经济思想史具有特殊的

意义。

本文以有限的篇幅,初步勾画了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性研究的开端期,阐述了中日两国学者都对此作出独具特色的贡献,但所有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既有启发后学的开创之功,也有待发展和完善之处。重点分析了日本学者的研究专著。指明中国经济思想史从创立时起,即是各国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尤其对东亚各国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今天各国学者更有责任共同发展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

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而日本的中国学特别是日本学者如何研究中国,同样是中国日本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内容,应当引起中国学者足够的重视。

#### 注释:

①参见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6月。

②③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赵人俊《序》、唐《自序》,第14页。

④《古书》,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唐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李书,世界书局1927年版;黄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熊书,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赵书,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赵书,正中书局1935年版。

⑤参见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⑥⑦⑧⑨⑩参见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4年版,《序》,第4、21、39~191、346页。

⑪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史》,曹贯一译本,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版。

⑫⑬⑭⑮⑯参见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有斐阁1935年版,第260~275页,《例言》第1~4、2~3、3~4、35、175、181、187页。

⑰沟口雄三:《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载《新史学》第1卷第2期1990年6月。

⑱参见小岛祐马:《中国的社会思想》,筑摩书店1967年版,第445~452页;《儒道两家经济思想的特征》,载《经济论丛》第4卷第3、5号1917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出发点》,同前第4卷1917年;《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同前第7卷第1、2号1918年;《王夫之的经济思想》,同前第7卷第3号1918年等。

⑳㉑㉒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43~44、76、102页。

(特约审稿 严清华)